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题解

#### 一、本研究中笔者对几个名词、术语的认识、界定与使用

##### 1. “民族”、蒙古族

当我们讨论民族文化时，对当代汉语中的“民族文化”一词的理解：往往下意识想到的这仅仅是指少数民族的文化（如同“民族学院”的“民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都是指“少数民族”一样）；或者认为这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并针对西方文化而言是指中国文化；抑或认为这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的文化，等等。

应该说这种种的理解都是不错的。然而它却使我们发现当代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的确是一个不确指的、语义模糊的词语。本研究在叙述过程中，常常要使用到“民族”一词，为了不至于使具有广泛意义的汉语词“民族”——既指现代民族；又指国内外自古至今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如同上例中居于不同层次含义的“少数民族”、“汉族”、“中华民族”混为一个层面上，造成完整思想表述上的混乱，本研究在使用“民族”这个词时，大多是指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凡是涉及国家含义时，则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一词。同样的道理，在使用“蒙古族”一词时，仍然是指中国境内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族；只是在历史意义上使用时，才包含现在中国境内外的所有蒙古人。

## 2. 卫拉特——西蒙古

历史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蒙古的称谓有不同的解释：蒙古语“Oyira”含义是“亲近”“邻近”的意思，即“Oyirad—斡亦刺惕”是“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的含义。<sup>②</sup>“林木中百姓”之义。蒙古语中“oi”作“森林”解释，“Arad”作“民”，合成词为“林木中百姓”。“卡尔梅克”本身的含义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广义的含义一般是泛指西蒙古部众，狭义的含义是专指留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众；还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的含义及其在翻译中如何表述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在上世纪曾经有过多次的争论。本文为了节省篇幅，集中对主题的论述，不再追述这一过程。关于此可参阅下列诸文：马戎：《民族与民族意识》（见《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民族”定义》（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1.）；《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4.）；《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2001.1.）；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马寅：《马寅民族工作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编印，1985年）

有人认为是 16 世纪初厄鲁特西迁后，中亚穆斯林的文献中，对遗留在故乡的卫拉特部众的称呼，后来专指留居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众；有的学者认为是突厥语，14—16 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传播时，生活在这里的卫拉特人大多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因而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就将他们称为留下的人等等。笔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西蒙古”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个主要是指当今聚居在我国西北各省（区）的蒙古人而言，实为中国西北地区蒙古族的简称；另一个则是历史上所说的“漠西蒙古”（即元代的“斡亦刺惕”，明季的“瓦剌”，清时的“卫拉特”、“厄鲁特”、“额鲁特”）。历史上的“漠西蒙古”一般指以四部卫拉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为主体的、不同历史阶段尚包括巴图特、辉特等部落的蒙古而言。这些人的后裔，现在已分别属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三国境内，各有称谓。当今我国原属蒙古卫拉特部的后裔，也主要居住在我国地理位置上的西北地区。笔者在论述到当代这些后裔的情况时，将分别以“新疆蒙古”、“青海蒙古”、“内蒙古阿拉善蒙古”、“甘肃肃北蒙古”来称呼。

## 二、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意义

文化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特点和文化传统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是文化存在的载体，所以文化具有了民族性。可以说“民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多民族大国之一。中国各民族不仅具有多民族统一体的多层次性文化特点和文化传统，而且还由于历史原因出现了诸多所谓跨国民族的存在。蒙古族（包括西支）便是其中之一，它也具有

<sup>①</sup> 周星：《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28 页

了某种程度上较明显的国际跨文化特征。怎样使这种多层次性文化间协调发展；怎样促进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发展中发挥交融、向心变迁的积极作用等等都是我们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与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剧烈变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民族文化的剧烈变迁的过程、趋势、结果如何？如何引导？又是关乎中华民族在团结共生的前提下发展、复兴的重大问题。

因而，进行分层次、多角度的历史、现实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多层次性出发，通过对整体文化与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问题（即亚群体文化的变迁对整体文化凝聚力的影响；整体文化的发展如何引导亚群体文化变迁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并获得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特征以及如何引导民族文化变迁势态方面的信息；对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力作用，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第一，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史实和近百年来同外国列强抗争中命运相系而铸就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56个民族的同胞都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在这里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凝聚和团结的纽带。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涵着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她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之所在。但是，从“民族也是一个文化过程”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含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其文化过程，还是某一民族的文化过程，都还缺乏系统的科学梳理与研究。这样，实施旨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进步西部

大开发的战略时刻，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工作者因使命感与责任感，理应投入到这一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中来。由此出发，我们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整体中华民族文化，单一某具体民族文化及其他亚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它必然深刻地反映着这些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既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又含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还存在着少数民族文化与主体文化——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了解这些多层次的复杂关系，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从民族与文化的视角，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审慎处理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通过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性现象，认识我国在转型期间参与国际全球化事务中，文化变迁应选择正确取向。我们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这是由于市场、生产、消费被开拓为世界性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各国、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相互影响的日益频繁。由是，出现了“世界文化”。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变迁必将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有些西方强国“一体化”而炮制的“世界文化”，从近年的趋势看，也夹有某些势力在全球重新推行强权政治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对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化，应该采取区分的态度：把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进步的世界文化结合起来，既不过分强调民族性而离开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又要以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对世界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分析，排除其中落后、腐朽、反动的文化侵蚀。尤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分裂主义势力往往是通过文化渗透，引起文化冲突、政治文化变迁等等手段而达到分裂主权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任何文化也需要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改造，以实现有益的变迁。并通过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透视相互之间的关系，梳理文化变迁的现象、类型、制约因素以及有

关规律性启示，这对我们制定民族政策、文化政策及相关引导措施具有深远意义，对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包括涉及跨国民族间的国际关系也有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变迁的内涵丰富，本书是从大文化，即广义文化的视角，以西蒙古文化变迁为个案来进行探讨的。最后力求总结出一些能够指导一般的规律性文化变迁的启迪。本书所依据的大文化观念是目前世界上已普遍认可的广义文化定义，即“文化是赋予一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为特点的，那些精神的和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完整的集合”。这区别于只指精神文化、思想文化的小文化概念。大文化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文化观念。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一般比较赞许加拿大学者 P·谢弗的归纳：即“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事物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物，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sup>①</sup>。以上大文化的概念主要是把自然世界和文化（人文）世界加以区分，大文化的文化世界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认为，在上述范畴内，民族的文化变迁，主要指对原民族文化传统的改变而言。而变迁的内容，既包括民族特色的方向性文化，也包括生活习俗文化。文化变迁可能是重大的质的变迁，如改变民族认同的变迁、改变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变迁等。文化变迁也可能是同质文化演进的局部变迁，如，从白桦树皮向毛毡为壁的帐幕包房的演进，本族生产工具的演进等。应该说，这些类型的变迁，在西蒙古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这些不同变迁显然有不同的内外原因，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通过西蒙古文化变迁的个案，有可能探索出一些对当代现实社会有引导意义的启迪。例如：

一是，了解文化变迁与族际关系的关联，以引导中华各亚文

引自阎家胤：《西方文化面面观》，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2期。

化的向心变迁。

二是，“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费孝通）。

三是，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载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思想保证。如果民族文化被“同化”或消灭，该民族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是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为标志，它们是相互促进的，等等。

这既是笔者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也是笔者选择“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原因。

## 第二节 民族学有关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民族学是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族体，以动态的观点研究其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习俗信仰等物质文化、社群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部内容。因而“文化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学对文化的研究有其系统的理论方法。民族学通过文化的研究可进一步明确“民族”的内涵与特点；透过文化可揭示负载它的族群社会；通过文化研究可增强国内外民族间的了解、信任与和平相处；可推动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 一、文化的定义与结构

“文化”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既传统又时髦的语汇。“文化”的概念是个争论不休而歧义层出的问题。“文化”一词的涵义在中国和外国有着各自的演进过程。对于文化的本质涵义的争论和不断的探索，肇始于 19 世纪中叶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学界公认的最早定义是由英国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

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阐述的：“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sup>①</sup>泰勒的“文化”定义，为以后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及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为界定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奠定了基础。重要的是，在泰勒的“文化”定义基础上，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学家奥格本、亨根斯、维莱等学者，补充了物质文化的内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于 1952 年出版的合著《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罗列的从 1871 年至 1951 年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160 多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A·莫尔继而统计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达到 250 种。诸多定义、类型接踵而来。“大致分为三种：文化作为一种演化论的定义，指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类史几百年来人类特征的演进过程；文化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群所积累的思想、传统、风俗、技艺和工艺成果的总和，因而指某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东西。在这种定义中，‘文化’往往是一种研究单位，成为不同文化比较和分析的基础。同时，它与民族精神这个概念有内在联系；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指的是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及规范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行为的总和”<sup>②</sup>。前苏联学术界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广泛地讨论过文化定义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随着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引进，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五四”前夕，陈独秀、李大钊

转引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3 月，9 页。引自 E.B. Tylor, *The Origins of Culture*,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8, p.1.

② 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84—85 页。

等人发表论文，就东西方文明的讨论而开始探讨文化问题，并随着研究的深入，掀起了探讨文化问题的热潮。蔡元培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漱溟解释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他的深入阐释将文化的内容渐趋系统化；梁启超认为“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胡适首次将文化与文明加以区别，提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等等。虽然这些定义还不够完善，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在这些学者的认识中已经基本形成。80年代随着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恢复，中国再次掀起了文化探讨及文化定义争论的热潮。

可以说，文化定义纷繁、文化研究火热，强烈地向世人揭示着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发展却是绝对的。因而文化的研究是世世代代人们所沿袭的一个关乎自身生存的命题。文化的定义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目前中国学术界大体上认为文化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中国民族学界的文化定义是广义定义的具体化解释：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并吸收了前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相关理论方法。关于文化的构成要素或是结构，中国学术界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派观点的影响，形成了二

元结构说<sup>①</sup>、三元结构说<sup>②</sup>、四元结构说<sup>③</sup>、多要素说<sup>④</sup>等分类法。

以上各种分类法，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通过文化结构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文化这个有机整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也就是在文化变迁中，文化的内部层次性是什么？二元结构说认为：物质文化决定和推动着精神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三元结构说认为：文化在结构上分三层，物质文化属于表层，精神文化属于深层，制度文化属于中层，三个层面之间有机结合，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四元结构说认为：精神文化是最稳定的核心层。依次是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为外层。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最易变动，但精神文化中的很多要素会超越客观而存在，进而支配人的思维、行为与创造等等。

文化是个有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发生变化，必然引起整体中互相关联的其他部分的反应。这些分层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进行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具有许多启发意义。

## 二、文化变迁相关理论与方法

文化变迁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间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392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13页。

② 许嘉璐：《语言与文化》载《新华文摘》2001年1期134页，摘自《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7日。

③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2—35页、201页。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6页

④ 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11页。

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sup>①</sup> 由于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有些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家则惯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还有些学者称做文化变异或文化转变。“文化变迁”的研究最初是由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学家研究“文化进化”逐渐发展来的。19世纪末 20世纪初，由反进化论思潮的兴起，开始使用“文化变迁”一词。

早期进化学派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他们主要涉及的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传播学派重视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主要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他们忽视了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功能学派着重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同时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心理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不同民族认识和忘却个体心理的过程；社会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经历时日的文化之修正，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历史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相应变化；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或是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等等，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

文化变迁是个动态的概念。包括了变迁的动因、过程或途径、时间与变迁特征的结果等等诸多因素。

人们往往将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和动力合为一称做“动因”。对此各派各抒己见：“生物因素说”认为文化变迁是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变化而发生的基因库或基因群的变化；“地理环境因素说”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心理因素说”认

<sup>①</sup>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211页。

为人类本能的冲动就是文化变迁的原动力；“文化传播因素说”认为文化在传播中发生变异；“工艺发展因素说”认为科学的发展创造引起文化变迁，工艺发展是推动力量等等。

目前中国人类学 / 民族学界普遍认为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即内部原因；二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的，即外部原因。文化变迁的动力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在动力系统中协调运作。这一动力系统有纵向的运动和横向的运动。动力系统的纵向运动使人类社会内部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使社会内部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作用。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推动着纵向运动，横向运动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变化汇入纵向运动所引起的文化变化之中。研究社会文化变迁，要研究社会内部的变化即纵向的变化，这是各种合力形成的动力系统的纵向运动所促成的，同时也要关注外部条件，即横向运动。动力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结果不同。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的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变迁，这种方式被这一群体足够数量的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特点以后，可视为文化开始了变迁。

文化变迁的过程或途径包括创新、进化、发明（革新）、发现、传播或借用和涵化。进化是由社会内部发展而引起的，文化的进化自然引起文化变迁。发现是使某些已存在的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所知。发明是对先前的材料、条件进行新的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发明和发现可有意识和无意识。当社会接受了发现和发明并有规律地加以运用时就引起文化变迁。传播指文化形式的借用与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动。借用指从另一个群体引入新的文化因素。传播和借用是双向进行的、相互的，是选择的过程。涵化是文化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概

念。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持续接触、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是区别于文化传播，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概念。文化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涵化的两个前提条件。文化涵化的过程可包括：一是文化的接受过程。通过文化之间的文化特质的传递一种文化的新元素加入另一种先前存在的文化内容中，或新元素取代原先的内容因素。二是适应。将接受过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系的部分或全部协调起来的过程。包括融合和同化。三是抗拒。涵化过程中，由于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压力太大，变迁发生过猛，致使许多人不易接受，导致排斥、拒绝、抵制或反抗现象。

文化变迁需要时间来完成其过程，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不同，文化变迁的过程可长可短，其速度也可快可慢。我们可以根据时间和变迁的特点不同而划分出变迁的阶段性的。可用历史复原法、剖面分析法、研究一再研究法、变迁的纵向研究法或称持续观察法等方法研究文化变迁。

中国前辈学者们，在探讨人类学 / 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兼收并蓄国内外各派理论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既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又十分注意在研究中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就此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人类学 / 民族学的传统。宋蜀华先生强调的“民族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关注纵横（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sup>①</sup>即为该传统。笔者认为青年一代的人类学 / 民族学研究者应该在继承前辈学者们的传统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原则，批判地吸收西方人类学各学

<sup>①</sup>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18页。

派的理论方法作为借鉴，继续探索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中国化发展道路。

### 第三节 前人关于卫拉特——西蒙古文化的研究

#### 一、卫拉特——西蒙古文化研究状况

##### 1. 中国

(1) 关于卫拉特——西蒙古的研究，重大的成果首推历史学方面，其成果累累。在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先世史、族源、分布、系谱、经济社会、宗教及其与中央政府、其他临近诸族关系、与俄国间的关系、历史人物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诸多学术著作。例如，《准噶尔汗国史》（[苏]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准噶尔史略》（编写组，人民出版社，1985年）《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王宏钧、刘如仲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马汝珩、马大正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苏]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硕特蒙古史略》（蒙古文版）（乌云毕力格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年）、《瓦剌史》（白翠琴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编写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6年）《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牟一之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卡尔梅克史评注》（[法]帛希和著，耿昇译，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土尔扈特部落史》（张体先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等著作。另还有《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王辅仁陈庆英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哲仓·才让辑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等,民族出版社,1988年)等专题史著作及关于卫拉特——西蒙古民间文化、民俗、部落史、地方史等专题的蒙古文、俄文专著及论文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史学研究对从其他学科角度进行西蒙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起到了先导作用。其中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整理、介绍和分析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2) 西蒙古文化研究中,独特的语言和文字研究占主要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于1985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决定推行胡都木蒙古文,放弃托忒蒙古文。为此目的出现了一批语言文字方面的成果。却精扎布、托·巴德玛的《蒙文和托忒蒙文的对照语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布仁巴图等编的两种对照辞典、却精扎布等编的《卫拉特方言话语材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辞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白依斯哈力、策仁敦德布编《蒙古语青海方言辞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诺尔金、乔丹德尔等编《方言词典》(蒙古文版)(民族出版社,1992年)等。

(3) 西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是抢救、整理、翻译、研究和出版了英雄史诗《江格尔》。1979年新疆与内蒙古两区成立了《江格尔》工作小组。1979—1982年间新疆、内蒙古两区分别用胡都木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出版了托·巴德玛和宝音贺希格在新疆搜集到的《江格尔》15章。此后,工作组先后到新疆蒙古族聚居的24个县,重点采访80多位“江格尔齐”,录制了187盒录音磁带,包括157篇文章和部分片段,约19万诗行,汇集出版了《江格尔》资料本1—9集,正在汇编的还有8集,

1985—1987 年以托忒蒙文出版了包括 60 章 8 万诗行的《江格尔》(第一集、第二集); 1988—1989 年于呼和浩特将此《江格尔》以胡都木蒙文再版。10 章 2 万诗行的第三集也已出版。霍尔查汉译新疆版本《江格尔》(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和巴勒汉译的《江格尔》(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相继出版。1982、1988 年相继召开了《江格尔》学术讨论会。1989 年在北京举办了《江格尔》成果展览。1991 年成立了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与此同时, 全面开展了英雄史诗《格斯尔》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贾木查著《史诗 江格尔 > 探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萨仁格日勒的《史诗 < 江格尔 > 与蒙古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民间文学其他体裁的资料的搜集与出版工作, 也蓬勃发展起来。《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卫拉特蒙古传说故事》、《蒙古族民间故事》、《德德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青海民间故事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传说》、《卫拉特民间故事》、《卫拉特民间传说故事》、《肃北蒙古民间故事》等。

(4) 西蒙古民俗方面, 蒙古文版的著作有: 纳·巴生编著《卫拉特风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萨仁格日勒编著的《上蒙古风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齐·艾仁才、特·那木吉拉编著的《卫拉特民俗》(托忒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斯琴孟和编著的《阿拉善蒙古人》(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等。汉文版的研究著作有郝苏民著《文化透视: 蒙古口承语言民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 法学方面, 道润梯步校注的《卫拉特法典》(蒙古文), 1985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卫拉特法典》(托忒文)载《汗腾格里》1981 年第 4 期。翻译刊载了戈尔斯通斯基《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1980 年俄文版、帕拉斯《蒙古族历史资料集》所载 1776 年德文译本、梁赞诺夫斯基《蒙古部落习惯法》所载

1929年英文译本、《蒙古习惯法之研究》所载 1931年日文译本、迪雷科夫《17世纪蒙古法古文献》1981年莫斯科版。马曼丽的《浅议〈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性质与宗旨》（《准噶尔史论文集》1977—1981）、白翠琴的《试论卫拉特法典》（《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等论文。

(6) 宗教方面，最主要的是收入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蒙古卷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中关于咱雅班第达的文献、资料；西·诺尔布校注的《扎雅班第达传》原蒙古文本以及青海蒙古人、第三世松巴活佛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作的《如意宝树史》的藏文汉译本；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的《蒙古佛教史》的汉译本以及巴赫《准噶尔地区的黄教及其寺院研究》（《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1期）等论文。

(7) 有关行政机构及大专院校的系、所中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成立了“江格尔”研究会、“格斯尔”研究会；“卫拉特研究室”、“卫拉特蒙古文化研究室”等。并举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创办了报刊。新疆创办了《卫拉特研究》、《汗腾格里》（托忒文）刊物；青海的《柴达木报》；内蒙古阿拉善的《巴音森布尔》、《阿拉善语言》、《卫拉特文献与研究》（民间不定期刊物）等，无疑对建立西蒙古文化研究者队伍、推出有质量的研究成果、推动研究进程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8) 开展了西蒙古地区的实地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编写的《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十四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等部门的专家学者联合考察（成员：马大正、蔡家艺、康右铭、郭蕴华、巴赫、陈世良、谭吴铁、刘德平、冯锡时、诺尔布）成果《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宗教调查资料汇编》、苏北海的《新疆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